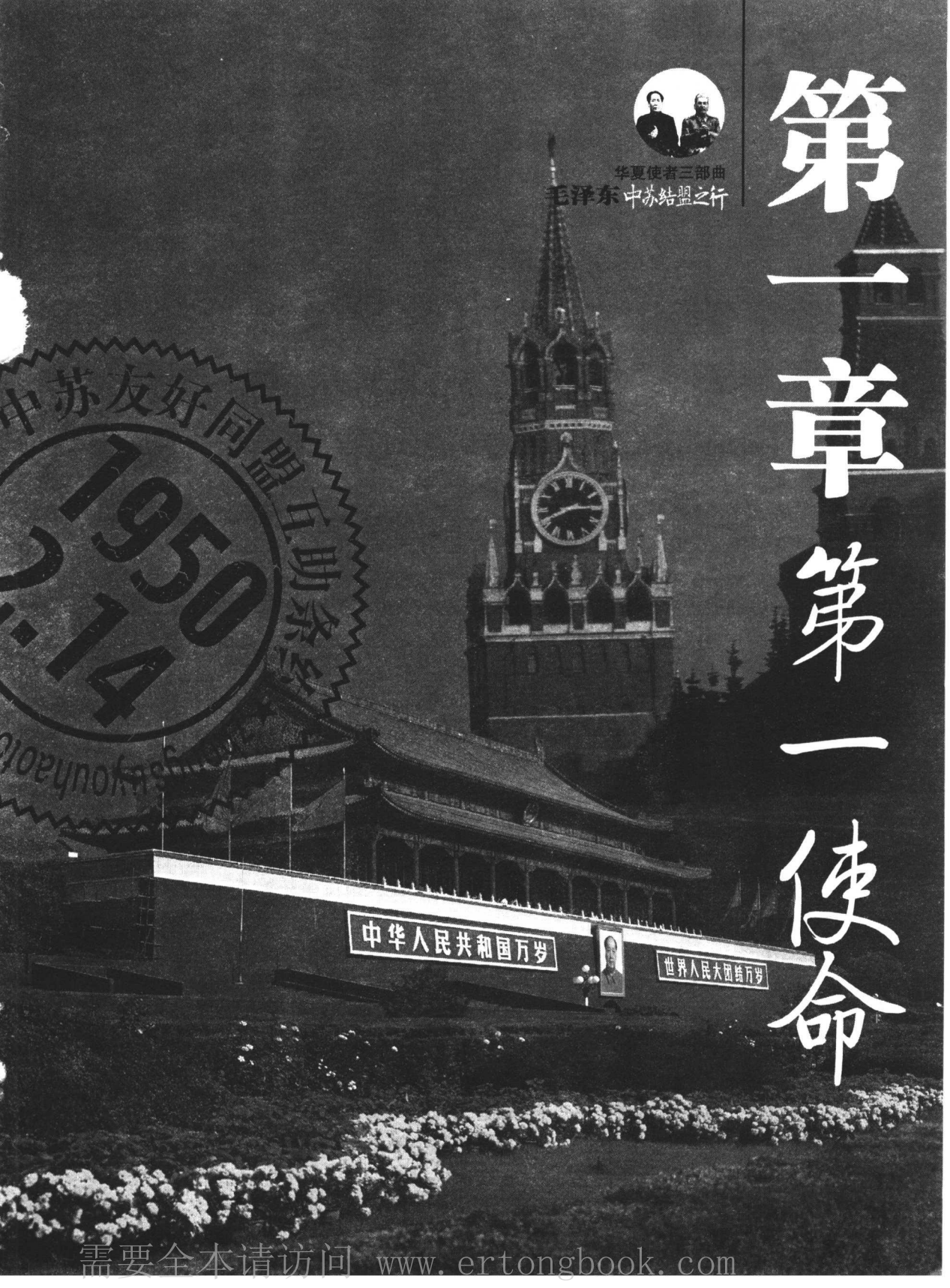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

公元1949年10月1日,是20世纪一个伟大的日子。

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万众云集，红旗飘扬。

将近下午3时，毛泽东、朱德、宋庆龄、周恩来、刘少奇、张澜、林伯渠、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等人，依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主席台前就位。

身材魁梧、面容慈祥的毛泽东身穿特意为他缝制的“礼服”——一套美国黄色将校呢制服，显得神采奕奕，他面对广场上翘首仰望、凝神注视的数十万群众，热情地摘下帽子，露出宽阔的前额和长长的黑发，向欢呼的人群频频招手。

顿时，天安门上下掌声雷动，如暴风骤雨一般，经久不息。数十万双眼睛一齐望着天安门城楼，身着节日盛装的群众，像盛开的花朵，铺满了整个天安门广场，在阳光的辉映下，分外妖娆。

广场上的红旗在蓝天的衬托下，像彩霞一般随风飘动，人们兴奋欣喜的面孔汇成了欢乐的海洋。

3时整，林伯渠看了看手表，低声对身边的周恩来打了个招呼，然后便宣布开会。这时，毛泽东手持讲话稿，面对麦克风，用他那乡音浓厚的湖南话，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这一庄严洪亮的声音惊天动地，响彻环宇。顿时，万众欢腾，山呼海啸。

此刻，毛泽东将要亲手按动面前的升旗电钮。他用那双扭转乾坤的大手，伸出一个指头，稳稳地按在乳白色的电钮上，久久没有松开。

一面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向天空，迎风招展。

54门礼炮齐鸣28响，每一响都惊天动地。这28响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先烈们前仆后继、奋斗牺牲的28个年头。

天安门广场上空，同时响彻了激越高昂的国歌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

升旗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事业正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胜利召开，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最后，毛泽东说：

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是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8个春秋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领导中国人民终于筑成了新的钢铁长城。第一次以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但纵观全球，欧风美雨，仍咄咄逼人。动荡复杂的世界，是否会承认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呢？

想到这点，毛泽东此刻并不十分乐观。

其实，毛泽东的担心并非不无道理，因为他深知中国人民所从事的事业，是开天辟地的革命伟业。它不仅彻底推翻了千百年来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扫除近百年来的民族屈辱、陈规陋习，而且还打破了旧的世界格局，也惹恼了帝国主义列强。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那些多年来一直想鲸吞蚕食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们不但不会承认它，而且还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它、推翻它。那些深受侵略和压迫的弱小国家，对中国虽抱同情，有心支持，却无能为力。加之苏联的斯大林对自己又一直持怀疑态度……

所以，毛泽东曾担心地说过，我们建国以后，如果外国三天没有反应，不予承认，那就有问题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后，外交上面临的首要紧迫任务，便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告知世界各国政府，争取各国、首先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承认。

早在建国之前毛泽东在提出外交上“另起炉灶”的方针时，即已明确指出：

1. 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任何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将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对待；

2. 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这一方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中得到了确认和体现。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读的《公告》通知各国政府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不易处理的问题。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采取的第一个外交行动，由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直接领导，亲自部署。

这时，原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解放还不足半年，国民党政权机构南迁广州，中国国内战事也尚未结束。除苏联大使迁往广州外，一些国家驻华外交机构先后撤离中国，但也有不少国家，包括一些大国的外交机构和外交代表尚未撤走，留驻原地保持“立足点”或进行观望。

这些外交机构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三地。

中央决定以周恩来外长公函形式快速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送交各国当时的驻华外交代表。公函中，首先告知这些驻华外交代表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宣告成立，并明确指出：“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这封公函对收件人一律不称官衔而称为“先生”，这既表明新中国、新政

府的成立，公函具有权威性，又避免造成承认旧中国外交关系的误解，是一份很特殊的外交文件。

对文件的发送，周恩来亲自作了周密部署：

在北京，由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于10月1日下午派干部送交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多米尼亚八个国家设在北平的旧总领事或领事，他们收下公函（其中多米尼亚领事离去，由秘书代收），签了回执，进展顺利。

对于在南京、上海两地如何进行，周恩来分别于10月1日、2日连发两次指示。

10月1日致电南京市委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除电告《公告》全文外，并嘱“校正无误后以最好的硬纸”印出，做好准备，俟签字公函自北京送到后，即附入公函，送达各国使馆。接着又于2日晨致电南京市委转黄华并告上海市委，转达外侨事务处处长章汉夫，告知北京送交公函、公告情况。要黄华接电当日约见在南京的14国旧大使、公使，作如下口头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已于昨日将公函并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分送给在北京的苏、美、英、法等八国旧领事，凡是旧领事在北京者，则于今日派人将文件送来南京转达诸位。在正式公函来到前，本人奉命将此事转告诸位。文件内容即为昨日新华社发表的政府公告和外交部部长公函。

周恩来还指示：今日的口头通知，必须向他们声明请其转达自己的政府。如彼等拒绝转达，则需将其口头声明记下。在送文件时，需取回收条或拒绝接受的书面回文。

由于当时各国外交机构和外交代表驻地时有变迁，行踪不定，周恩来又作了交代：以上各事，凡南京有使馆代办者，上海不再作同样转达，故必须黄华将上述手续进行完毕以后，再告章汉夫，究竟有哪几国人员还在上海需要章汉夫处理。

周恩来还估计到各国留守官员可能提出向各自政府发电报的问题。为此，他指示：如果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可许其经过国际电台向本国拍发密码电报。

周恩来第二个指示要南京先向各国外交代表作口头通知后送文件，可能是为了表示我国对此项行动的重视，使各国尽早知道中国之态度；他对谈话口径和可能遇到的情况如何处理，都作了具体交代，有若指挥军事战役，周到细致，万无一失。

南京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根据周恩来指示于10月1日晚约见在南京的旧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使、公使或代办，因2日是星期日且有群众游行，会见延至3日晨在外侨事务处进行。

出席的有11国外交代表，分别为：印度、缅甸、暹罗（泰国）、埃及、澳大利亚、加拿大六国大使；奥地利、葡萄牙两国公使；波兰、阿富汗、土耳其三国代办，黄华按指示作了口头通知。公函及《公告》 10月7日送达各使馆。

捷克斯洛伐克在南京只有一名职员留守，无外交官，黄华请示后补送。

瑞士留守人员不在南京，也是后来补送的。

南京于10月7日完成送交公函、《公告》任务后，上海于当日采取行动。

上海因于1949年5月27日解放，迟于南京一个多月，有些大使馆、公使馆自宁迁沪，加上原有的20多个国家的总领馆、领事馆，曾有31个国家的外交机构。但上海解放前后，多数驻我机构已撤离回国。

10月7日前尚在上海的有：瑞典大使、丹麦公使、墨西哥代办、菲律宾总领事、挪威使馆秘书。

上海外侨事务处于10月7日将公函附《公告》送达上述各馆。

巴西大使馆留守人员表示系私人代表，无法将文件转达巴西政府，故未收下。

希腊大使馆迁沪，巴拉圭、芬兰、委内瑞拉领事馆仍有留守人员，但因翻译情况较迟，周外长签字的公函10月底才送到上海，补送时芬兰、委内瑞拉领事馆已撤离，致芬兰函由瑞典代办收转。

这样，就在新中国政府成立后的短短时间内，先后共向30多个国家送交了公函、《公告》。

各国复函中除缅甸、埃及、澳大利亚三国外，都回避称周恩来为外交部长，英国、印度、荷兰、比利时等国称“周恩来将军阁下”、“周恩来将军”或“周将军恩来”；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葡萄牙等国则称“周恩来先生”或“先生阁下”。所有复函均为个人签名，无官衔。

印度、澳大利亚、葡萄牙在复函中表示他们政府正在“考虑”、“研究”中国的公函和《公告》，在此期间，希望由使馆或领事馆同“贵国政府”或“中国的适当当局”保持非正式的联系。

加拿大代办奉命访黄华，表示希中国人民政府能按国际惯例通常对待领事的办法，准许加拿大在华领事行使正常职权。

然而，让毛泽东感到欣喜的是：仅仅过了十多个小时，就从苏联首都莫斯科拍来了世界上第一封致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贺电：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业已收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本年10月1日之公告，其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政府在研究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之后，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故特通知阁下：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受苏联政府之委托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安得列·葛罗米柯
1949年10月2日于莫斯科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并兼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的师哲，立即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份热情的贺电译了出来，并亲自送给了周恩来和毛泽东。

苏联政府的反应之快，使全世界都始料不及。许多国家领导人，这时还在瞪大眼睛看着新中国有没有人理睬呢！

由于苏联的首先承认，紧接着蒙古、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和东德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以最快的速度拍来贺电，纷纷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

面对着这些贺电，毛泽东如释重负，不由得高兴地笑了。

入夜，天安门广场火树银花，载歌载舞，中南海内，灯火辉煌。

毛泽东从北京饭店参加开国盛宴后，又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了欢庆开国大典的五彩缤纷、千姿百态的焰火，当他回到在丰泽园的住处菊香书屋，已经是深夜11时许了。

尽管忙碌了一天，毛泽东此刻仍然精神饱满，毫无倦意。面对着斯大林从莫斯科拍来的贺电，毛泽东不禁浮想联翩，他点燃一枝中华牌香烟，独自在室内书柜前思索良久。然后顺手取出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书，打开封面，便看到斯大林的半身照片，不由端详起来。斯大林的形象，是那么庄严而深沉，嘴边的胡子好像掩盖着无数的秘密。那淡淡的笑容，似乎又表示出深厚的友谊。

毛泽东虽然从未见过斯大林本人，只是在书本上、电文中和别人的传言之中，听到过关于斯大林的信息。而此刻，在新中国正式诞生需得到国际承认的关头，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首先伸出了友谊之手、同志之手，使毛泽东备感温暖，备感亲切，同时也备受鼓舞，大大地增加了他的自

豪感和自信力。

毛泽东十分清楚地记得，早在三个月之前，就在决定新中国前途、命运的时刻，1949年6月30日，他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所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经为新中国的外交路线方针作出过明确的判断：

“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和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这就是建国后一度成为新中国外交路线总方针的“一边倒”政策。

因为毛泽东知道，要建设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件不容易的事，也是他和中国共产党人从未经历过的大事，建设需要友谊的援助，要学前人的经验。而这方面，苏联的经验是可资借鉴的。因此，他认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想到这里，毛泽东立刻拿起桌上的红色专线电话耳机，分别打电话将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请到自己的住处来，共同商谈他着手准备出访苏联、亲自会晤斯大林的问题。

2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中，共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五位书记。而在这五人之中，惟独毛泽东是从未出过国门，其他四位都先后有过“留洋”的经历。

刘少奇于1921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又去莫斯科出席过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还曾一度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周恩来更是早在1917年便东渡扶桑，留学日本，后又于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

朱德于1922年去德国留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于1925年转赴苏联学习。

任弼时也于1921年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并于1938年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所以，毛泽东常常自嘲地说他自己是既没有喝过洋墨水，也没有啃过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48 4

1948

1949 1

1

—

60

12 21

1949 5

3

10

20 30

1943

1945

1945

然而，毛泽东这位从中国湖南山沟里走出来的共产党领袖，素来有不受人指挥的性格，他有着与斯大林一样的自信和坚毅。所不同的是，毛泽东的自信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和仔细分析之上的，而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所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关键的东西。

正是这位坚强勇敢的毛泽东，顶着国内国外的巨大压力，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进行人民解放战争，同蒋介石国民党进行艰苦的较量。现在，中国形势的发展和斯大林当初预计得正相反，貌似强大的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却被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打垮了。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现已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如今，毛泽东以新中国国家元首和中国人民领袖的资格，将要来苏联和我会晤，这必然会使斯大林感到尴尬、难堪。不过，斯大林所幸的是，在中国解放战争中，他见蒋介石一直和美国打得火热，还把大量的美军引入中国，而毛泽东则领导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很快便在东北首先打开了局面，于是他下决心及时调整决策：由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开始转向支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

这些天来，斯大林曾多次询问他身边的人：“这位毛泽东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呀。”

可是他身边的人也无从说起，因为毛泽东从来没有到过苏联。

一阵由远而近的脚步声，打断了斯大林的深思。

“斯大林同志——”马林科夫轻声慢步地走到斯大林身边，低声询问道，“您看，如何给毛泽东复电……”

“这个……”斯大林从嘴上取下大烟斗，拿起桌上的电报看了又看，觉得毛泽东的来电中无论措辞和语言，都是正确而得体的，他沉思片刻，便吩咐马林科夫道：“以苏共中央和我的名义给毛泽东复电，欢迎毛泽东到莫斯科来！”

1949年11月13日，斯大林又接到毛泽东发来的谢电：“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

4

1949年的整个11月间，周恩来、聂荣臻、滕代远、李克农、罗瑞卿和汪东兴等人，都忙于毛泽东的出访准备工作。

在此期间，中央指定党政各有关部门准备和编写有关的资料，并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选定和筹集赠送给斯大林的祝寿礼品。

前者都是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过问和指导下完成的，后者则由江青帮忙“参谋”。

原来，江青在1949年夏季曾去过一次莫斯科，并受到过斯大林的礼遇和夸奖。她向毛泽东建议要带一些能表明中国国情的礼品去，最好多带些农产品和手工艺品。

江青告诉毛泽东，苏联冬季最缺少的是新鲜水果和蔬菜。她首先提出要送的是山东的大白菜、大葱，潍坊的大白萝卜、大鸭梨；其次是湘绣的斯大林肖像、江西景德镇的陶瓷、浙江杭州的龙井茶、安徽祁门的红茶、江西的竹笋、福建的漆器、杭州的纺织品与刺绣等。

最后，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打电报给山东，请山东准备最好的大黄牙白菜、大葱、大白萝卜、大鸭梨各样5000斤，由中央派飞机直接从山东运回北京。另外准备了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一套、湖南湘绣被面30条、枕套60个、江西南丰桔1000斤、冬笋500斤、浙江杭州的龙井茶30斤、贵州的茅台酒100瓶、上海的中华烟500条。

11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召集聂荣臻、滕代远、李克农、杨奇清、汪东兴等人在中南海紫光阁研究毛泽东出访苏联的具体布置。

汪东兴首先汇报了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的组成情况。

毛泽东的专列由前卫车、主列车、后卫车三部分组成。其中前卫车由五个车厢组成，上驻50个士兵和一些铁路工作人员；后卫车也有五个车厢，每节除有50个士兵担任警卫外，还装有毛泽东给斯大林70寿辰准备的礼品等物。主列车由十个车厢组成。汪东兴安排了一个连的兵力在前几节车厢内作警卫，汪东兴、叶子龙、李加吉同毛泽东乘坐一节公务车。毛泽东乘坐的公务车内共有四个房间，毛泽东用中间的一间，汪东兴等几个人用后面两间，前面还有一间做会客室。主列车还包括餐车、行李车等。

紧接着，聂荣臻汇报了关于护路部队的调配和布置情况。

中央军委已分别从华北军区和东北军区抽调大量兵力，负责保护毛泽东专列的安全，从北京一直到满洲里，凡是专列经过的路线，护路部队每公里一个岗哨，沿线所有桥梁、涵洞和制高点，都已布置了足够的兵力。

“嗯！不错！”周恩来听了颇为高兴地点了点头，毛泽东也微笑着点燃起一枝香烟。

但接下来李克农的情况汇报，却使得毛泽东和周恩来吃惊不小：

“最近我们监听台截获一个潜伏敌台活动频繁，据判断和主席这次出访苏联有关！”

“噢？”毛泽东抽了一口烟道，“来者不善嘛！”

“克农、奇清两同志——”周恩来当即指示说，“我们的国家才刚刚解放，对隐蔽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清扫，你们要百倍警惕，防患于未然，绝对保证主席出访的安全！”

“公安部！”毛泽东将烟蒂在烟缸内用力一摁，然后把手一挥，“在我回国以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李克农和杨奇清响亮地表示：“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最后，毛泽东向汪东兴等随行人员宣布了三条纪律：

一、此次出访为秘密行动，对外不宣传，不带记者；

二、沿途各地可允许当地党政军领导两人来车上看望，其他人不要来；

三、在中国境内沿途不下车，也不准向地方要东西。

事后，周恩来又单独召见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副部长杨奇清，进一步落实毛泽东出访沿线的安全措施。周恩来还要求罗瑞卿和杨奇清亲自护送毛泽东到满洲里，路上有什么情况，要及时向他通报。即使是正常情况，也要每隔四个小时通报一次。

同时，周恩来要求李克农立即抓紧对敌特潜伏电台的侦破工作，限期破案。

5

洁白的雪花，把京城打扮得玉砌银装，分外妖娆。

12月6日清晨，瑞雪初霁。毛泽东、陈伯达、师哲、叶子龙、陈秉承、沈剑心、李加吉、田树彬和汪东兴等一行由中南海丰泽园出发，直抵北京西直门火车站。

此刻，西直门车站上，一列长长的专列，正在大批军警戒备森严中整装待发。

毛泽东来了。他穿着一身银灰色的中山装，头戴呢帽，外罩一件小呢斗篷，从轿车上下来，神采奕奕地走向欢送的人群，微笑着与前来送行的人一一握手告别。

毛泽东访苏，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出国访问，非同一般。因此，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宋庆龄、张澜、林伯渠等全都前往车站送行。

毛泽东笑着握住周恩来的手，颇为风趣地对这位外交能手说：“一言为定,我在莫斯科等你啊!”

“请主席放心！”周恩来轻轻地摇动着毛泽东的手，爽朗地笑道，“只等你一声令下，我们立即出发！”

告别了所有送行的人，毛泽东才登上专列，站在车门上还向大家挥手致意。

列车长鸣一声，徐徐驶离站台，奔向那遥远的北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毛泽东访问苏联作出的决定是：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祝寿之后，就在苏联休息和参观；有关中苏两党两国间条约、协定的谈判，则由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随后去办。

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及苏方负责中长铁路恢复工作的工程师柯瓦廖夫也同行。

此外，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铁道部公安局局长冯纪、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等人负责护送。

12月的华北大地，到处都呈现出一幅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美图景。

一趟编号为9002次的专列，像一条绿色的钢铁长龙，吐着团团白烟，肩负着共和国的第一外交使命，在凛冽的朔风中，风驰电掣般地向东北驶去。

这个专列，原本是美国政府前年送给蒋介石的礼物，十分高级。不仅专列车厢造型别致，线条流畅，而且内装饰华丽，色彩柔和。车内卧室、会客室、会议室、秘书室甚至浴室，一应俱全，无愧为总统公务车。然而可悲的是蒋总统却无缘享受，他自己只是在专列运抵南京时去看过一眼，连一次还未乘坐过，不久即被人民解放军缴获，最终成了毛泽东的战利品。

9002次专列由中央警备团政委张延桢亲自驾驶。这位晋中大汉早在参加革命前，曾在山西学过火车司机这一行，经过战争烽火考验而又经验丰富，理所当然地成了这次9002次专列司机的最佳人选。

不过，尽管如此，为了确保安全平稳地开好这趟新中国第一次外交活动的专列，周恩来和汪东兴还是让他专门“离职培训”了半个月。正是因为这样，今天他才会将这趟专列开得又快又稳。

专列经过的路线，只见护路部队每隔一公里有一个岗哨，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密切巡视着四面八方。

专列每到一站，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铁道部公安局局长冯纪等领导人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